

石點頭

鍾逸傑回憶錄

陶傑  
譯



香港大學出版社

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

香港大學出版社

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十四樓

©香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

初版二〇〇四年

重印二〇〇四年、二〇〇五年

ISBN 962 209 664 6

版權所有。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，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  
允許，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。

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

<http://www.hkupress.org>

聯志製版印刷有限公司承印

# 目錄

---

第 1 章	初來乍到	11
第 2 章	新界	17
第 3 章	荃灣和離島（一九五九——一九六一）	25
第 4 章	元朗（一九六二——一九六七）	41
第 5 章	改革的種子	57
第 6 章	文化大革命	67
第 7 章	首席助理輔政司生涯	73
第 8 章	一九七三年初訪中國	81
序	衛奕信勳爵	xiii
前言		xi
序幕		1

第 9 章	中國和國際足協：不必再等待	95
第 10 章	重回土地	101
第 11 章	打破隔閡	109
第 12 章	租約將滿	117
第 13 章	港人治港	125
第 14 章	頭條內幕	133
第 15 章	廈門之憶	139
第 16 章	開始談判	145
第 17 章	談判結束（一九八三——一九八五）	159
第 18 章	簽字和慶祝	165
第 19 章	布政司歲月	173
第 20 章	新的一頁	181
第 21 章	電燈和核電	189
第 22 章	尤德爵士去世	195

第 23 章 城寨

第 24 章 衛奕信時代

第 25 章 新花園

第 26 章 一九八九年之變

第 27 章 一九八七到一九九〇的政治發展——天安門事件與船民危機

第 28 章 衛奕信爵士其人

第 29 章 另一個聲音

第 30 章 過渡的最後五年（一九九二——一九九七）

第 31 章 誹謗與另起爐灶

第 32 章 選舉與重起爐灶

第 33 章 倒數

第 34 章 塵埃落定

第 35 章 天氣報告

跋

譯後記 陶傑

## 第1章

# 初來乍到

一九五七年夏一個酷熱的清晨，我和妻子帶著剛出世的兒子到了香港。從英國出發飛了三天，飛機最終輕輕掠過九龍的山坡，迅速突降，衝過在與跑道平衡交錯的道路上停下來讓飛機先降落的車輛。我們坐小輪過海，第一次見到陡峭的山脊、連綿的群山和碧綠的海水，還有灰濛濛的城市建築。戰後的香港掙扎了十二年，才適應了命運的安排——一百年前由英國割佔後，從此孤懸於華南的涯岸之外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大大改變了中國政治經濟的面貌，也對香港影響深遠。雖然香港是僅存的十九世紀條約通商口岸，經此卻不再可以進入中國。事實上中國對香港是封閉的，對全世界也如此。戰後的香港，人口從五十萬劇增至二百萬，超過一半的人住的是一種設計奇特的屋子——一種鐵皮屋頂的木屋，依山而建，散亂地藏於溪流旁的樹叢中。

我們的住所位於半山，遠眺可見我上班的那陰沉而毫不顯眼的工商署大樓，混處於

海傍眾多辦公大樓之間。我們住在海傍和山頂矚目的高尚住宅之間的地段，雖然薪水不高，卻也請得起兩個穿白褂黑褲的女傭。每天都有不同的商船周旋於港口的錨碇與舳板之間，還有汽船和駁艇在各色船隻間穿梭而行，而來自中國的帆船在一片繁忙中淡然而過，取道資本主義香港這條捷徑，再轉北航向共產主義治下的汕頭。港口遠處是九龍灰暗的民居，其後是重巒疊嶂，沒入中國的蒼茫。

雖然香港從中國手裏得到大量廉價蔬菜、豬肉及其他供給，但還得作好最壞打算，準備中方斷供圍困。我負責的是確保香港有足供幾個月用的糧食、煮食用木柴儲備，以及供應人體必需養份的大荳和鹹牛肉。我還必須控制和不讓共產黨染指戰略性化學品，這些化學品主要供鐵皮屋工廠用來製造搪瓷壺和鍋子，以及銷往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煤氣燈上的塗層燈罩。我學會了怎樣在全球市場上買大荳，了解到過期罐頭牛肉的危險，怎樣買賣成網的婆羅洲紅木柴枝——在罐裝煤氣問世之前，香港的雜貨店賣給廚房煮食用的，就是這種剝好的木柴。

大米的交易是潮州人的天下。潮州人佔香港的五分之一人口，社群內部團結一致。他們來自福建和華南廣東接壤的地區，由於歷代以來不斷向外遷移，泰國的米商也來自

潮州。潮州方言鼻音粗重，他們一用方言交談則恍如自成世界，其他的中國人不易聽得明白。香港的大米多由這些商人進口，拍賣會無聲進行，只有賣家才能看見買家的叫價，買家只是在拍賣者的算盤上移動一兩顆小珠子。沒人說話，只是點點頭，交易就成了。大米買賣是一架環環相扣的連鎖列車，每一個環節都好像有賴於另一方：農民有賴出口商，入口商有賴出口商，批發商有賴入口商，零售商有賴批發商，而家庭主婦則有賴商店店主。沿著這條連鎖線，過不了幾天或者幾個星期，錢就從廚房流到了稻田。這簡單的買賣過程背後，是社會、道德、經濟各種關係的活動，一切都要保持平衡：這些關係從香港擁擠的街道一直延通到泰國稻田的農民裏。

最初兩年我在香港和商人、店家以及日用品、工業原料打交道，這為接下來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。

香港蠢蠢欲動，開始尋找戰後自己的身份，下議院和英國政府則放任無為。香港把殖民地身份攔在一旁，形成了責任感並自力更生，還意識到要開始興建房屋來安頓中國內戰後抵港的上百萬人口，擺脫混亂，建立秩序。這裏的人比戰前更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該擁有甚麼權利，英國戰後重新評估大英帝國的角色和殖民地的地位，但香港不在評估



之列。香港一時還憧憬建立更具代表性的自治政府，但大陸移民如潮湧至，香港就此謹慎地走向一九九七年那個終極日子。

政治現實決定了這種慢兩拍的步伐。香港不像其他殖民地，並沒有因為急於獨立而匆忙開展選舉。香港人知道，佔殖民地大部分面積的新界在租約期滿後的大局一日未定，未來的日子還會變化無常。香港有充裕的時間發展社會和經濟，建立一個活力充沛的大都會，成為世界的一大奇蹟。「爆炸的人口」——幾百萬來香港避難的人帶來了機器、資金和技術，在搖搖欲墜的棚屋之間開展工業。政府相應建起了外表簡陋灰暗的徙置區，一家人一個房間，共用房子之間的公用廚房和廁所。孩子們倒異常穿戴整潔，揹著書包，吃力地爬樓梯到天台學校上課。兜售各種家庭用品的小販，填滿了各幢房子之間的空隙。徙置區的房租很低，從中國進口的食物又多又便宜，只是謀生不易。這些家庭在狹窄的小屋一住經年，從無抱怨，只想為自己和孩子擺脫貧困而拼搏下去。

香港文化生活的嫩芽開始紮根。中英協會<sup>(註一)</sup> 員有中國籍、英國籍、葡萄牙籍的

(註一) 原名 The Sino-British Club，為香港殖民地時代上層行政文化人士的聯誼組織。

學術或專業人員，其中一位儒雅的傑出詩人布蘭登<sup>(註二)</sup>，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。我是中英協會的祕書，這個協會大力促成新大會堂的建成。自從世紀初匯豐銀行佔用了廊柱森然的舊大會堂，香港就欠缺了這樣的一個文化場地。中英協會也主力創辦了香港管弦樂團，並草創了第一屆藝術節，在未完工的天星碼頭舉行。一經覓得能演奏中國樂器的樂手，就我所知，首個公開中樂音樂會就在一九五八年假西洋會所富麗的大堂舉行。現在，中樂團和中國樂器演奏的悠揚樂韻，已處處可聞了。

維多利亞市區位於香港島，和九龍半島之間不僅是一水之隔。九龍是一個很不同的地方，另一個天地，是前往哥爾夫球場的必經之地。沒有甚麼必要冒險涉足九龍，因為一切舒適生活所需都在港島。而且，到九龍去無論如何都得坐渡輪，累人得很。香港身為國際城市，十九世紀以來，商業和專業活動都集中在港島，甚至直到今天，雖然有了三條過海隧道連接兩端，許多住在港島的人對九龍仍然知之甚少。很快我們就收拾細軟坐渡輪到了這另一邊的世界，自一九五九年起，我們大半輩子都在這片當時尚是香港鄉郊的地區工作。

(註二) 布蘭登 (Edmund Blunden, 1896-1974)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軍人詩人，一九五三年來香港任教香港大學英文系，六十年代初歸國。

元朗（一九六二——一九六七）

元朗人有特立獨行的精神。一八九九年英軍向新界西部挺進，元朗人憑落後的武器頑強抵抗。這一區有無數村落、稻田、烏頭魚塘、中央市集和海濱蠔場，這個古老的圍村更和一位宋代公主的傳奇有關連。

香港向來缺水，但在邊境以北往珠江口向內延伸數百哩都是河源，不愁沒水。一九五七年，中國政府提出在邊境附近興建水塘向香港供水，而香港須向大陸交付香港市民所用的水費。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易，香港也同意了。成千工人不斷用竹籃子和木輪車運送泥土，六個月之內香港邊境外已建起了一段土壩。一條巨大的黑色水管從大壩蜿蜒穿越片片稻田，將江水送到元朗的大欖水塘。村民強烈反對，對他們來說，這等於佔用他們的農地，影響鄉村風水，至為擾民。他們要求賠償。前警署助理署長諾曼費沙，一個處事絕不含糊的蘇格蘭人，從退休生活裏被緊急召回，處理有關事宜，他終於達成合理的補償方案平息村民的不滿。一九六二年我被派去接替他。

我們剛到元朗不久，一直細水長流不斷從廣東經陸路或海路偷渡來港的人潮，突然大量湧入。有關這突如其來的偷渡潮，沒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。有人說由於大陸一九五七年大躍進，全國人民集中火力土法煉鋼，荒廢農事，農村發生饑荒，生活困苦。另一說是大陸有流言聲稱香港開放邊境。這事非比尋常，我與諾曼費沙到邊境長滿綠草的土丘上視察，夏天的烈日底下，不絕的人潮順著山勢爬下，就如中國銀幕上一幕史詩電影。男女老幼雙手抓著鐵絲，屏息靜氣，一張張緊張的臉壓著英界那搖搖欲倒的鐵絲網。天一黑，這些等待的人潮就會推翻鐵絲網進入香港。

幾個月內共有幾十萬人進入香港。有些被抓到，從香港與中國的鐵路口岸被遣返。市內的居民湧到邊境，希望遇到他們的親人。人群不時發生推撞，一些富同情心的村民盡力保護他們不被強迫遣返。不久以後，就好像大陸突然關上水喉，人潮忽然停止了。

香港，「一個了無人煙的荒島」，一直是中國各地移民南下的聚集地，他們憧憬香港遍地黃金，來找尋生計，希望淘金夢成真能改變命運。雖然港府曾試圖阻止，但香港邊境廣闊，水陸交通四通八達，吸引力極大。直到七十年代末，香港仍沒有和廣東省政府達成遣返偷渡客的協議，若以輕鬆的體育名詞來形容這嚴竣情形，當時的偷渡客如果能成功「抵壘」，進入市區，就可以登記申請身份證，獲得安全保障。

在二〇〇三年寫這本書的今天，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依然是每天受關注的問題。三十年前，在毗鄰深圳的新界北區，大陸來的偷渡客構成了我們每日工作的背景。

一九五八年，香港一般市民還在睡夢中時，新界西北部的山坡發生大災難。暴雨短時間內將元朗淹沒，水深數呎。元朗位處低地，高出海平面不到數呎，雨水氾濫，居民被淹死，農作物和牲口盡毀。這次災難導致一個大型防洪計劃開始進行，工程包括在農田、魚塘、鄉村甚至市鎮底下埋下一條條混凝土水渠。為了減輕劇變，這平靜的市鎮還有另一個發展計劃，而一些發展仍持續至今。今天的元朗已從一個小鄉鎮變成一個有幾十萬人口的市鎮。

連接元朗和九龍的，只有一條二十五哩長的狹窄公路，這一點一直為居住在山頂的大班、官員和居民所忽視。誠然，六十年代那地方並沒有甚麼可以彰顯半世紀以來殖民地統治的成就。沿東南方向駕駛，經一條小路，有兩座長滿樹木的山丘，分別為理民府和警署據守。那不過是兩座有瓦頂和陽台、抵擋夏天滂沱大雨的鄉村小屋而已。距離屋子約半哩，大街上有無數商店。

英國人借用印度測量師紐拉士來命名制洪的新渠，元朗開始進入二十一世紀。通往

市鎮的道路拓寬了，這等於入侵了鄉村的土地，要由身穿紅黃道袍，頭戴黑色四方帽的正統道士做法事，安撫被騷擾的神靈；還要莊嚴焚燬寫著村民名字的紙條，割開公雞的咽喉，把雞血和酒混合，灑在地上。村民和道士一起跟著鈴聲誦經，繞著村界遊行。神靈滿意，村民也獲得賠償，然後工程正式開始。

往後幾年這情景不斷重複，泥頭車和壓路機鏟平了市鎮附近的郊野，興建大樓、辦公室和住宅，為元朗提供前六十年殖民地統治所沒有的公共設施。元朗居民總是自己照顧自己，從來不抱怨被忽視，現在也同樣默默接受一切轉變。無可否認，這會改善一些居民的生活，但那牧歌般的田園生活也將一去不返。

鎮內唯一的市場，不是由政府興建而是由當地的合資公司所建。元朗的領袖和居民過去一直為滿足社區各種所需工作。本地的慈善機構興建了一所小醫院，分發中藥，近年開始提供另一項選擇——西醫。村民以銅泵車組成防火隊，今天卻放在祠堂的神壇後面，積滿塵埃，生滿銅銹。村內有自己的更隊負責保安，甚至有自己的稅制——「公秤組織」，政府的稅收官鞭長莫及。這一組織公開投標營運，每一宗市場交易，如要用公秤作準的話，就要繳費。市場上用來量度重量的叫做「秤」，是一根刻有標準刻度的

水平銅桿，一邊放貨物，另一邊放砝碼，商人提著中間的繩子來保持平衡。「公秤組織」所得的收入用作慈善，如資助學校，幫助窮人和有需要的人。

靠近中國大陸的邊境，在新界北部有三個市集：屯門、元朗和大埔。每個市集都是一個公秤。早期的荃灣是一群分散的村落，從沒有發展出固定市集的規模。上述三個市集全年都有約定俗成的墟期，根據農曆，每半個月有三日墟期。元朗自豪地有一間小戲院和一個聲譽不太好的遊樂場。但當地的主要娛樂，是一大清早男村民聚集在茶樓吃早點，一面喝粥、吃燒賣、豆腐或者油條，一面和街坊討論鄉間瑣事，恩怨情仇，村中聞人的起落，還有官場奇聞。

他們常常談起一九六三年的颱風溫黛。颱風在南中國海造成災禍，直撲珠江口，在香港上空像噴射機一樣咆哮了好幾個小時。颱風警報下主要人員留守民政署，準備等颱風一過，馬上外出報告村莊被淹，道路為倒塌樹木所阻的災情，有需要時向附近的軍營求助。駭人的狂風猛吹了幾個小時，元朗位處西面，一如以往出現水浸，屋頂被吹走，大樹被拔起。颱風這回更吹起東面的海水，致使東面沿海的市鎮和村落被水淹沒。有很多人淹死。船隻被大風吹離停泊處，隨著大浪衝到西面的海島上，像一隻隻擱淺的鯨

魚。來不及找到避風港的漁船都被打翻，或者在石頭間擱淺。像我這樣的「白頭宮女」，四十年來每次談到颱風溫黛，在沒有與之相比的風災出現之前，總是以它作為比擬日後其他颱風的基準。

「上帝要你滅亡，必先令你瘋狂」。這一年，颱風過後緊接著大旱。就好像印度季候風來臨之前，烈日曝曬，田野被烤乾，香港的水塘日見乾涸，即使有中國大陸水塘的幫助，也無濟於事。情況日益嚴重，家居供水限制到每四天供水四小時。住在山邊木屋和寮屋的市民到街喉前耐心等待，挑著珍貴的水桶和水罐回家，等待四天以後的供水。運水船駛往珠江內海採水回香港，那兒的海水已被山水沖淡。採水回來，便送到快速建成的深井碼頭，經輸水管送到已經乾涸的大欖水塘。

我們很幸運，因為理民府供應的是從後山溪澗收集來的自來水。雖然大旱底下流量減少，但不至乾涸。我們忽然很受歡迎，朋友們爭相從市區來訪，享受完痛快的淋浴，再帶著一桶桶水回家。

元朗的鄉紳也為此出了分力，他們齋戒一天後穿上白袍，在我的陪同下（因為做重要事情時必須有「主要官員」在場）一路上山走到那條養育整個平原、生生不息的河流



的源頭。在一塊大圓石下，我們向一個小神壇上了三柱香，叩了三個頭。任務完成，留下清香繼續燃燒，我們便沿路返回田間。如其所願真的下雨了，只可惜不足以戰勝乾旱。

英軍駐紮在新界的地方，也即第四十八軍團的總部，位於元朗市鎮以東，四面環山的村落和田野之中。軍中的啞喀步兵營則駐紮在邊境附近。那兒有邱吉爾坦克、大炮和直昇機，小型飛機跑道上有時更有戰機到訪。那是一隊令人難忘的軍團，指揮官性格突出。沒有人會質疑，如果真的與幾百萬解放軍打起仗來，軍團能發揮甚麼作用，但他們是一種保證，而且有資料顯示，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部隊所有人都熱切希望盡自己所能幫助當地人。而到了天后誕（天后是一個對農民和漁民非常重要的本土神祇），也給了他們發揮的機會。

每年天后誕，每條村的漁民和農民都會舉辦巡遊，至今已有一些百年歷史，從前是在海邊，現在的天后宮已被土地包圍。這不是一般的巡遊。各村都嘗試以各自的華麗花炮，和飾滿粉紅花朵、紙紮僕從及其他民間故事的竹紮神臺去競妍鬥麗。每條村子都將自己的古老神像請到神輿上，村中一眾老幼緊隨其後。震耳的鑼鼓聲夾雜著嗩吶嘶叫般

的樂聲，沿路一直放炮仗驅趕路上的邪靈。沿街的觀眾非常興奮。大型的潮商和菜農社群，沒有自己的村子和廟宇，卻擁有最專業的鑼鼓樂隊，像京劇演員一樣畫了臉的舞團，模仿領隊手持的假蛇擺動。還有舞獅、舞麒麟和舞龍，伴奏的是大鼓和銅鑼，都放在手推車上。到達巡遊終點的廟宇時，將會上演一場激烈的爭戰，為了爭得從竹管裏射出、從天而降眾多花炮中最好兆頭的數字。然後在朱紅色的神壇前，把祭神的燒豬從頭到尾切開，燒肉分子眾人。最後，興奮而疲乏的村民陸續四散回家，各神像也回到各自的廟宇等待另一年的來臨。

天后誕是邀請英軍將領檢閱另類兵團的最好機會。大街上搭起竹棚、看臺鋪上地毯，軍團准將和地方權貴，在一片敲鑼打鼓聲中，檢閱巡遊隊伍中的民間神明、舞龍、舞獅和舞麒麟，隨行還有英軍的大鼓、鐃鉞和號角。巡遊成功地代替了過去雜亂無章的遊行。這在元朗已經成為每年有數千人湧去觀看的例行節日。

巡遊之後我們一起用午餐，餐桌上有蜜汁燒豬、油炸鮮蠔和醃檸檬蒸烏頭魚（魚是剛從魚塘裏撈起的）。午宴在趙聿修太平紳士的大宅舉行，他是一位圓胖親切的富裕米商。隨後趙聿修請我們當他長孫的教父教母。一個小孩神色凝重地走進來，跪在我們跟

前，向我們斟茶並獻上一雙筷子，叩了三個頭；我們則送給他一隻飯碗。我們至今仍和他及其家人保持密切關係，四十年來一直是非常親密的朋友。我們的「契仔」現在是一位成功的會計師和股票經紀，有三個兒子，其中兩個剛考進英國的大學。

那次巡遊檢閱是一個友好的開始，往後四十八軍團開展了一系列幫助當地社群的計劃：為偏遠村落修築道路，正好作為軍團推土機司機的訓練，還有出動軍方橡皮艇拯救洪水中的村民。這個軍團可不是充充門面而已，坦克車定時駛過市鎮到荒山中演炮，有時會在荒廢的田野操練。區內還有幾個指定的演炮區，彈殼散落附近村子，嚇跑過路的司機。女皇誕辰日，他們會從新界遠赴九龍參加大巡遊，巡遊隊伍包括銀樂隊、坦克、大炮和威武的啱喀兵。這是六十年代的香港，軍隊巡遊一直延續到不再合時宜為止。

前任理民官諾曼費沙，主張元朗應該加入香港業餘甲組足球聯賽（球員要做其他工作才獲得報酬，球隊的質素則視乎有多少運作資金）。元朗隊由身材魁梧的肉商聯會主席帶領，當地鄉紳全力支持，加上球員本身賣力，排名不斷上升，一九六二年我履新理民官時，元朗隊奪取了該年聯賽冠軍。市內舉行慶祝巡遊，沿街不斷燃放炮仗，還有慶功晚宴。身為理民官的我兼任當地體育會會長，因此成為香港足球總會的委員，後來成

為歐籍副主席，之後是副贊助人（十年後，這一身份令我成為政府中少數幾個可以出訪中國的人）。球隊被冠以「農夫」的稱號，一直參加甲組比賽，由於不能穩操勝券，贊助越來越少，最後退出聯賽。那時在香港業餘體育聯會及奧委會委員、精力充沛的葡國人沙利士先生的催促下，我幫助委員會主席重寫規章，引入專業足球，結束業餘生涯。

元朗沒有足球場，但財政司郭伯偉爵士，很樂意幫助那些願意自助的人，他是個嚴肅能幹，有新思維的官員。他同意批地，條件是居民自己興建球場。我的居所成了籌款晚宴的地點，鄉里同心協力，籌得足夠款項建成足球場，政府後來在這基礎上建起了一個現代化的運動場。中國鄉村向來沒有足球場或其他運動場，新界自然也一樣：土地是用來營生的，不是用來娛樂的。許多年來，新界眾多市鎮之中，元朗是第一個建起足球場的地方！

自助精神是中國道德倫理的一部份，沒有其他地方比香港有更多慈善組織。香港第一所華人醫院是由一間中醫館開始的，學校是由教會或華人團體舉辦的。元朗也不例外。當地的中醫師開設了第一所處方中藥的醫院，第一所學校也一樣。多年以後，政府才開始提供補貼和資助，但這些學校和醫院的營運仍然由當地居民負責。這情形在新界

相當普遍。直到五、六十年代，民政署才開始提供簡單的鄉村小學設計，政府出錢，當地的承建商出力。

另一傳統是老人由家庭照顧，其他地方如新加坡卻要立法來保障這種儒家精神。父母用盡一切方法掙錢，節衣縮食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，孩子們很孝順，努力讀書。這種力爭上游，絕不坐等政府仁慈捨捨的精神，推動香港社會不斷向前的力量無法估計。比如說，一個電梯操作員送子女到牛津留學，或者父母在香港擠在狹小徙置區，子女卻在加拿大當執業會計師、醫生或律師，類似的故事數之不盡。

每年都有各種節日和紀念日。有些很低調，祭祀就是一種很私人的事情，比如在門前上香，或在交通事故的地點舉行路祭。其他則是大型公眾活動，比如多達六十個人划動又長又窄的龍舟，在廟前的海面拼命前進，龍的眼睛點了朱砂，活靈活現。舞龍、舞獅和舞麒麟之前，也都有這一道點睛儀式，賦予神獸生命，而道士則祈求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

根據傳統習俗，元朗和其他許多村鎮每十年便舉行一次長達一星期的醮祭，驅除未來十年的邪靈；日夜不斷的齋戒和祭祀，為村鎮和居民帶來昌盛。幾天內就用竹子和鋸

鐵搭好一個教堂般的大型戲棚，能容納上千觀眾，觀看民間傳奇戲劇的演出。演員畫上一張張誇張彩臉，突出自己飾演的角色，穿上繡滿圖案的華麗戲服，插上孔雀或雉雞羽毛，聲音尖亮，聲線極高，配合優美造手，受到居民的熱烈歡迎。巨型的紙紮神像豎在場地另一個竹棚，裏面安設神壇接受祭品。這星期內村裏的父老會齋戒侍奉，其他居民則聚集為本村祈福。老人極為看重這個責任。有一年，一位年輕力壯的英國博士研究生獲准參加齋戒及祭祀儀式，每天都要摸黑起早，最後疲乏不支。這星期的最後一天，一場壯觀的大火吞噬巨大的神像；拆除竹棚時，演員們像來時一樣魚貫離場。

這些都是定期的節日，卻沒有人關注全年不同的藝術活動。一天下午我集合各地區學校的校長，怯生生地向在座諸位提出成立藝術委員會，即時獲得喝采和同意，這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委員會。接下來立即上演了一場粵劇，為全年的攝影展和畫展籌款，並為中樂團購置樂器。又開辦了自資的芭蕾舞班，由法籍老師授課，在這偏遠的華人市鎮竟大受歡迎。我們填補了這份空白，多年以後這一切成為典範，流傳到香港十八區。

那些日子既艱辛又愉快。到了周末，離開了辦公室的文件和決策，仍有整個星期未完的工作等著了結。市區發展上了軌道，繼續需求土地。較複雜的土地事務，開始時一

星期和執業測量師通一兩次電話，隨著發展項目不斷增加，他們的參與變成全職工作。在沒有安置區的情況下，要安置因開發土地清拆的寮屋居民，須要無盡的耐心去游說居民接受微薄的賠償，購買水泥及其他建築材料，興建另一間簡陋的小屋。買賣、抵押、繼承、續約和爭議，一個經濟活躍社群所有關於土地的問題，全都紀錄在新界理民府土地署。一個極度複雜的鄉郊社會，期待一個獨立、公平、公正的政府，去協調、介入並解決各種爭端，以一個外來者身份轉化為推動力，推行各種活動。

政府對興建社區中心有一套標準，但元朗雖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，市鎮內及附近的人口只有十萬左右，太少而不符合政策。我們是個繁榮而活力充沛的市鎮，卻沒有一個市中心或大會堂。政府克服內部一些反對聲音，決定接受「給我們一個中心，我們自會打理」的要求。「中心」的名稱太過堂皇，終於建成一個元朗大會堂，成立了管理委員會，有自己的展覽場地供藝術委員會使用，有場地給芭蕾舞團和中樂團練習，還有一個婚姻註冊處和幼稚園。

我曾提到，連接元朗和九龍的，是一條二十五哩的狹長公路，雖然多年以後，這條路拓建成一條高速公路，但在那個年代，離開元朗幾哩的路旁，是一片稻田和長滿葶

薺及荷花的水田，沿途是一群群灰磚築成的村屋。路邊一間間打開門面的店舖，貨物堆滿整條行人路。道路越接近屯門海邊，田野和村落後面的山巒也越來越高（屯門的中文原意為堡壘的門，但英文只叫 Castle Peak）。

屯門灣的避風港內滿佈桅杆傾斜、褐色船帆摺起、船尾寬闊的漁船，高高擱在水面。其他尾部窄平的帆船擠在一起，而一擺一蕩的舢舨為平靜畫面添上活力。路上陡峭彎角山崖上有一間集合儒、釋、道三教的寺院，俯視山下魚販和貸款給漁民出海的經紀所住的一堆堆鐵皮屋。這兒有漁民用品供應店、雜貨店，岸邊不遠處更有一艘兩層高的畫舫，用作舉辦慶祝或婚禮的喜宴。

沿岸駛出十餘哩，經過連串小沙灘和突出海面的高地，穿越發展中的荃灣便可到達繁忙的九龍街頭。我可能給讀者一個印象：我們從來沒離開過元朗。其實每星期我們都會來往這段二十五哩的行程到九龍幾次，若要渡海到香港，便意味著要在汽車渡輪的隊伍上耐心等待，或者選擇乘搭香港的遊客熱點——天星小輪。

其中一次這樣的行程，我與崔佛奇勒共晉下午茶，他生得高大瘦削，是政府高層，曾在尼日利亞服役。我們在希爾頓酒店咖啡廳見面，一起的還有奧力禾克船長，九龍半



島尖上的霍茨貨倉和藍煙囪公司的經理。我們三人都認識外展訓練組織：崔佛是從尼利亞的學校來的，禾克來自霍茨船運公司，霍茨是外展訓練組織的其中一位創始人。我則來自葛登史頓，並在那兒見過寇咸博士，是他提出外展訓練這一個概念的人。整個組織，是為了回應英國政府要求減少戰時非必要的海上傷亡。紫燕與我曾在亞巴多威度過了幾天，那是第一所外展訓練學校的所在地，我們亦曾協助成立馬來西亞的戶外訓練學校。

世界各地的外展訓練課程，旨在幫助任何階層和背景的青年培養自信，讓他們有能力應付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看似不可以克服的挑戰。我們三人在希爾頓酒店的下午茶敘，都同意外展訓練能帶給香港青年極大好處，他們在擠迫的城市裏缺乏機會探索自己的潛能，或去體驗香港東部海岸那些崎嶇山嶺，在海島之間遠足、野營、爬山、航海和扒獨木舟的挑戰與樂趣。在認同這活動目的的大公司支持下，配合賽馬會的慷慨支持，香港加入了這一組織。自此數以萬計的青年男女都可以釋放潛能，從參加外展活動中找到自信，香港人的生活增添了無限樂趣。

我們來香港已有九年，在元朗生活了四年多。這期間我們曾回英國「老家」一次。

在殖民地服務，即使是香港般發達的城市，也等於長年遠離英國的親人及好友。新界生活更進一步將我們從正常的香港社交圈子割離。當我們回到英國時，問候過我的健康和旅程後，竟沒有人對我們這麼多年來，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工作感到興趣！但對我們來說，元朗那四年改變了我們的生活，不只是因為我們離英國很遠，更因我們被放逐到一般香港生活之外。四十年後的今日，我和元朗的老朋友依舊常常聚首一堂，慶祝生日、結婚周年紀念，或者，只是風花雪月談談天也好。